

周恩来总理
光辉的战斗历程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目 录

周恩来同志在“五四”前后·····	1
周恩来同志在法国·····	8
周恩来同志在广州·····	11
周恩来同志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13
周恩来同志领导八一南昌起义·····	16
周恩来同志在南昌起义后的革命活动·····	18
周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	20
周恩来同志机智果断地解决“西安事变”·····	29
周恩来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从南京到重庆·····	33
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中顶风险战恶浪·····	38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谈判”时期·····	40
周恩来同志在南京梅园新村·····	44
周恩来同志转战陕北·····	49
衷心爱戴和崇敬毛主席·····	52
在伟大的反修斗争中·····	55
在尖锐复杂的文化战线上·····	57
周总理和群众心连心·····	63
一丝不苟地忘我工作·····	68
坚持无产阶级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72
周恩来同志为共产主义光辉战斗的一生·····	75
解放以来周总理历次出访活动·····	82
积劳成疾、抱病工作、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87
悼念总理,回忆总理生平事迹·····	93
外国友人、国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缅怀、赞颂周总理·····	109
后 记·····	126

周恩来同志在“五四”前后

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一九一三年，周恩来同志在沈阳第一师范附小毕业后，从东北到天津进了南开中学。他一方面刻苦学习，一方面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前途，成为《民权报》的热情的读者，白天上课，晚上读报，如饥似渴地吸收革命思想。周恩来同志成了学生领袖，组织了“敬业乐群社”，团结同学，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一九一七年，周恩来同志到日本留学，先进神田区高等预备学校，后来进了法政大学。在日本留学的两年中，他更加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阴谋，认识到拯救祖国是长期艰巨的斗争。

一九一九年五月，日本警察局长在演说中肆意侮辱中国，周恩来同志组织领导中国留学生在神田区的中华青年会馆举行抗议集会，周恩来同志起草了抗议书，迫使日本警察局长跑到中华青年会馆，哭丧着脸向中国留学生道歉。中国留学生的爱国主义斗争取得了胜利。就在这一年的暑假，周

周恩来同志回国参加五四爱国运动。

※

※

※

一九一九年，周恩来同志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

一九一九年七月，经过全国工人、学生和爱国人士的两个多月的斗争，五四爱国运动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卖国贼曹汝霖（一九一五年代表袁世凯北洋军阀政府在卖国的“廿一条”上签字的外交次长，这时任交通总长）、章宗祥（出卖胶济铁路经营权和济顺、高徐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这时任驻日公使）、陆宗輿（签订“廿一条”时任驻日公使，这时任币制局总裁）已被免职；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已经拒绝签字。一年一度的暑假又来临了，部分人的斗争情绪开始有所松懈，正在这时候，周恩来同志从日本回国来到天津，进了南开大学。

当时，天津学生联合会正想创办《学生联合会报》来推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听说周恩来同志回国了，大家都认为他是最理想的主编人，便邀请他担任主编。周恩来同志答应了学联的要求，并说：《学生联合会报》是非常必要的，要想使学生爱国运动坚持下去，必须注重爱国教育。我所以要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的斗争，同学们既然需要我编辑学生会报，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七月二十一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了。周恩来同志亲自为第一期写了题为《革新，革心》的社论，提出了要改造社会和自觉地改造思想的主张，给大家极大的启发。《会报》不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野心和阴谋，揭发卖国政府

一味投降帝国主义、压迫人民，号召人民奋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官僚的统治。《会报》在周恩来同志主编下，观点鲜明、内容丰富、立论精辟，不仅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社会各界的爱国人士也争相购买阅读，很快由三日刊改为对开一大张的日报。周恩来同志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不仅成为天津学生进行爱国宣传的喉舌，而且也成了领导天津爱国运动的重要阵地。

※ ※ ※

一九一九年八月，五四运动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山东戒严总司令的山东镇守使马良，杀害了回教救国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位领导人。山东特派代表到天津，要求天津各界爱国人民给以支援，惩办军阀马良。周恩来同志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立即公布山东惨案真相，指出惨案不但是山东军阀马良的罪行，也暴露了卖国政府与人民为敌的残暴本质，号召人民加紧团结斗争。它推动天津各界推派坚强代表再次赴北京请愿斗争。

八月二十三日，天津赴京请愿的十名代表，和北京的十五名代表共二十五人到总统府送请愿书，被大队军警逮捕，关进京师警察厅的拘留所。北京学生会立即打长途电话向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告。大家听到代表被捕的消息都激动起来。周恩来同志冷静地说：“这正是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简短的话语，使大家振奋起来。

《学生联合会报》出了号外，号召群起反对逮捕请愿代

表，营救被捕的代表。八月二十六日，天津学生分批赴京请愿的队伍，汇同北京学生共三、四千人分别包围了总统府、国务院和国会，要求释放代表，惩办马良。斗争坚持到第三天，警察总监吴炳湘调动全城军警、保安队，由新华门紧缩包围圈把请愿大队压缩到天安门里边，用枪托、皮鞭乱打学生，並逮捕了请愿总指挥，天津学生联合会负责人马骏。

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使北京沸腾起来！天津沸腾起来！全国沸腾起来！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的电报象雪片似地飞向北京政府。周恩来同志亲赴北京，为营救被捕代表而斗争。北京政府本想把二十三日逮捕的二十五名代表枪毙以杀一儆百，但在全国汹涌澎湃的爱国运动压力下，不得不在八月三十日将两次被捕的代表全部释放。

※ ※ ※

斗争的实践不仅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北京政府的反动本质，也进一步使人们觉悟到，救国的任务不那么简单。要救国需要冲破学生圈子，救国不能单靠学生，必须“唤醒同胞”。

一九一九年九月初，周恩来同志和赴京请愿的代表一同乘火车回津。在旅途上，他们漫谈起“今后怎么办？”这时有人建议：建立一个新的宣传机关，来承担这个新时代的任务。周恩来同志很赞成这个意见，并建议先由斗争中涌现出的一些最积极的分子，成立一个比学联的组织更严密的团体，同时出一个宣传刊物。这样一个倡议，说出了大家内心一致的要求，大家都十分赞同。于是，一个新的革命青年团体就酝酿起来了。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上午，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等二十个男女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在草厂庵学生联合会的办公室里讨论了团体的组织机构，出版刊物和组织发展等问题。并由周恩来同志起草、通过了十项决议。决议规定这个团体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因此出版的刊物取名叫《觉悟》，团体就叫“觉悟社”。“觉悟社”诞生了。周恩来同志经常主持会议，组织大家研究当时流行的各种新思潮，给大家讲国际国内的形势，讲日本侵略我国的野心和阴谋，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对我国的严重威胁，要想灭亡中国，称霸世界，更进一步启发了大家的民族爱国心，加深了大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切齿痛恨，他还经常给大家宣传列宁，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是我们的指南针。周恩来同志痛感搞文化宣传的人空谈的多，切实行动的少，无补于事。因而特别强调“觉悟社”不仅出一本“觉悟”，而且要本着“觉悟”的精神去实行，作改造社会的先锋；不仅是研究学术的团体，而且要成为一个准备“牺牲”、“奋斗”的组织，作天津作战的“大本营”；要实行互相批评，加强团结；吸收新社员时要审查他是否具有“牺牲”、“奋斗”和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日，《觉悟》创刊号和大家见面了，周恩来同志为创刊号写了两篇文章，一是发刊词，题目是《觉悟》，一是《觉悟的宣言》。在这两篇文章里明确宣布“觉悟社”的宗旨，提出“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顽固思想，旧道德……应该铲除，应该改革。”在反动统治下，社员在《觉悟》上发表文章都不用真姓名，而是用号码来代替，写了号码来抽签。周恩来同志是五号所以他

就叫“伍豪”，邓颖超同志是一号，所以她又叫“逸豪”。周恩来同志留法勤工俭学时写信回来还用“伍豪”，邓颖超同志在抗战时期还用“逸豪”的名字。

觉悟社的成立，在天津学生运动史上占重要意义，当时它成了天津学生运动的核心，使五四时天津学生运动更有组织更有活力了。

※

※

※

周恩来同志对觉悟社的同志们说：日本对灭亡中国，蓄谋已久，即或巴黎和会拒绝了签字，野心勃勃的日本也绝不会甘心，必然会另出新花样。后来，果然不出周恩来同志所料，北京政府在爱国人民压力下拒绝在和约签字后，日本又在巴黎“和会”制造所谓“山东问题要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的阴谋。北京政府竟不顾人民反对，同意中日直接交涉，准备投降。于是群情激愤，全国人民反对“直接交涉”和抵制日货的运动又如火山爆发似地高涨起来。

觉悟社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作了周密准备，一面揭露教育厅提前放寒假的阴谋，一面加紧斗争。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学生调查“魁发成”奸商私藏日货不报，被奸商勾结日本浪人殴打，学生代表到省长公署提抗议又被殴打逮捕，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也被查封。觉悟社转移到法租界一个同学的家里，继续拟宣言、印传单、坚持领导斗争。二十九日下午，周恩来同志领导各校学生千余人去省长公署请愿，并公推周恩来同志等四人为代表去见省长曹锐。省长公署大门紧闭、军警密布如临大敌。四名代表被从门坎洞里放进去后，就被殴打软禁。门外学生坚持到日落，

也被军警包围。周恩来同志登上梯子，看到同学被军警包围，立即向省公署副官提出责问，副官无言可答。反动政府竟下令用刺刀武力驱散学生，造成流血惨剧。当二百多名保安队将周恩来同志等四名被捕代表从省公署押送营务处时，沿途军警密布，周恩来同志等不断高呼爱国口号，沿途群众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敬佩和声援。在拘留期间，周恩来同志领导大家以绝食等方式继续反抗斗争。由于全国人民纷纷致电北京政府声援天津爱国青年的正义斗争。周恩来同志等被捕代表在被关押半年之后，终于在七月中旬恢复了自由，回到同志们身边，继续领导大家进行斗争。

一九二〇年八月初，觉悟社召开年会，周恩来同志作了报告，总结了一年来天津青年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他提出：只有把五四运动后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共同斗争，才能挽救祖国的危亡，改造旧的中国。八月十六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学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组织的二十三名代表，集会于北京“陶然亭”。邓颖超同志报告了“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多的活动；周恩来同志阐述了“觉悟社”年会上提出的“联合改造”的意义。会后，发表了《联合改造的宣言》和《约章》。宣言提出了：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必须以互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而且提出了“到民间去，切切实实地做事”的口号。“觉悟社”社员们的思想更开阔了，革命的种子开始萌芽了。

周恩来同志在法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男子差不多都去打仗了，工厂缺乏劳动力，法国驻华公使向北京政府的财政总长梁士诒接洽招华工赴法。当时寄居法国的蔡元培、吴玉章和法国人士一起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又设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想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吸收一批贫苦的有志青年到法国留学。一九二〇年秋天，周恩来同志在天津出狱以后不久，也离开祖国，远涉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当时到法国勤工俭学的还有蔡和森、蔡畅同志的一家，43岁的徐特立同志，以及向警予、赵世炎、陈毅、李富春、聂荣臻、陈延年、陈乔年等同志。

周恩来同志到法国后，住在贫苦的中国工人区，一面在工厂做工，一面在巴黎大学政治系听讲，同时专心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周恩来同志经常和蔡和森等同志一起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还一起成立了“工学互助社”。陈延年、陈乔年等同志还在巴黎办了一个书报社，宣传和推销马列主义书籍和国内进步刊物。

一九二一年二月，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同志在巴

黎酝酿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S.y)。一九二二年七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中国旅法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周恩来同志从德国到巴黎参加了旅欧总支部成立大会。会上选出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同志为委员。旅欧总支部包括旅法、旅德、旅比(比利时)三个支部。总支机关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哥德伏化街十七号一个小旅馆里，这里住着六、七个人，其中脱离生产专门做党的工作的只有二个人，就是赵世炎和陈延年同志。

总支出版了一种党内学习教育性质的刊物叫《少年》，即共产党少年的意思，是由陈延年同志主编的。他每天一刻不停地刻蜡板，油印。别的同志白天去附近工厂做工，晚上回来帮助他印刷装订。周恩来同志在第二期上发表过一篇阐述共产主义原理的论文，给同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总支的许多同志常常参加法国工会组织的活动，但是主要注意力还是放在华工方面。在巴黎附近的边古工业区成立了华工工会，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夜校，蔡畅等同志就在那里教过书。党在那里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工人干部，他们后来有的回国从事革命活动，有的被送到苏联学习。

周恩来同志还领导党跟反动的政治派别“国家主义派”进行了斗争。当时国家主义派在国内叫“醒狮派”，因为他们办的刊物叫《醒狮》。他们的代表人物曾琦、李璜等人在勤工学生中有相当影响。每到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周恩来同志便到近郊的大学区、工厂区、华工区、勤工俭学生集中地的小咖啡馆演说，揭露国家主义派媚日反人民利益的真面目。有时周恩来同志还找曾琦、李璜参加我党召开的会，或者由周恩来同志参加他们召开的会，在会上和曾、李对辩，

斥责他们，听的人鼓掌不绝。周恩来同志每次富有说服力的演讲，都传遍巴黎每个华工区与勤工俭学生集中地。结果使国家主义派在勤工俭学生中完全陷于孤立，进步分子都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不久，总支又出版了理论学习的刊物《赤光》，代替《少年》，刊登中国革命问题的论文。《赤光》虽是油印的，但内容丰富，字迹清楚，装订简雅，是华工和勤工俭学生欢迎的读物。

一九二三年初，周恩来同志亲自伴送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同志到柏林，帮他们办理好手续，送他们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同志由于革命工作需要回到祖国，投入新的更加伟大艰巨的斗争。

周恩来同志在广州

一九二三年底，周恩来同志结束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活，经莫斯科回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积极从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和毛主席站在一起，坚决同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一九二四年五月，在我党的倡议和推动下，在广州建立黄埔军官学校。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等同志任教官。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党在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积极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当时黄埔军校中共产党员占学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在第一军三个党代表中，我党占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我党占七个，在连排中都有我党的组织，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了基础。蒋介石为了篡夺领导权，对周恩来同志恨之入骨，在黄埔军校组织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来对抗我党的力量，并指示何应钦专门监视周恩来同志。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东征军阀陈炯明时，就想乘机把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共产党员赶出军校和第一军，但由于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共产党员的坚决斗争，使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

可是陈独秀一味采取右倾退让的政策，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日益猖獗。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日，蒋介石和他的法西斯党徒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同时，还逮捕了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中山舰事件”后，毛主席主张对蒋介石的反叛行为给以坚决的揭露和有利的还击，并抓紧时机建立共产党的武装。但陈独秀生怕得罪蒋介石，破裂统一战线，却顽固地拒绝毛主席的正确意见，继续主张退让，蒋介石完全篡夺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的领导权。

“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同志在毛主席亲自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课程，并配合毛主席组织全体学员到广东海丰等地考察农民运动，实行军事训练，为全国各省区培养和训练了大批从事农民运动的革命干部。

周恩来同志还非常关心省港大罢工，经常不辞劳苦，于星期日下午为罢工工人、农会干部、军人作国际政治形势报告，经常到工人纠察队视察工作，指导军事训练，参加工人纠察队会议，并同队员们谈心，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群众的斗志。据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一位老工人回忆说：“周恩来同志待人接物和藹可亲，对同志非常热情，对工作极端负责，大家都很敬佩他，这是由于他大公无私，一心为革命”。在周恩来同志的关心下，省港大罢工坚持达一年零四个月之久，这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是罕见的。

周恩来同志领导上海 工人武装起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来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接着，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是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为了配合广州国民政府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的北伐战争，党在上海连续发动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同志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会见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的老战友时，亲切地回忆说：上海工人的三次起义，后两次我是参加的。当时我个人是负责领导武装的。武装起义是成功了，但我们经验不足，不会领导。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第二次武装起义和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第一次起义一样，由于准备不足，和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国民党右派的破坏而失败了。周恩来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康生、罗亦农、赵世炎等），总结了前两次起义的经验教训，又周密细致地进行第三次起义的准备。周恩来同志经常深夜来到工厂，同工人们促膝谈心，启发大家

的斗争觉悟，检查准备工作落实的情况。周恩来同志衣着朴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工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周”。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还记得，当反动资本家勾结反动军警，交替使用武装镇压和桌面谈判的两手，威胁收买工人，瓦解工人斗志，破坏工会组织，使斗争处于非常困难的危急时刻，周恩来同志冒着极大的危险来到工厂，亲自召集厂里党团员、工会积极分子和工人纠察队骨干开会，仔细听取大家的意见，精辟地给大家分析斗争形势、使大家增加斗争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当时为准备起义而组织训练了五千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周恩来同志指示工人纠察队利用各种机会和不同形式，公开地、秘密地，在厂内、厂外进行军事训练，学射击、学扔手榴弹。周恩来同志还把自己乘坐的汽车给商务印刷厂的工人用，巧妙地敌从敌人的眼皮底下把武装起义用的枪枝弹药送到预定地点。

起义的前几天，在中共江浙区委积极分子的会议上通过了起义的计划。起义的日期，当时没有决定，起义时作战地点分为闸北、沪西、沪东、南市、虹口、浦东、吴淞七个区域，以周恩来同志为总指挥的起义总指挥部也成立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晨七时，中共江浙区委发出了举行起义的指令，三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时在各业各厂内宣布第二次总罢工，开始第三次武装起义；在罢工后一小时内，将工人纠察队与罢工群众由租界调集到闸北，在预定的集合处集合；集合后立刻按照预定计划对警察署或兵营与军队驻在所开始行动；起义胜利后，立刻成立区的市民代表会议。中午，八十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便转入武装起义。